

古籍保护

专刊

藏书报

2017年4月10日

第7期(总第8期)

本刊主编: 刘晓立
版式统筹: 常英
联系电话: 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 liuxiaoli0119@163.com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沪召开理事会

本报讯(记者李普曼)2017年3月31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一届三次理事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由协会秘书处统筹协调,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复旦大学图书馆具体承办。来自全国古籍收藏、修复保护、整理出版、古籍研究等领域的70余位理事出席了会议。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杨玉良应邀出席会议并致辞。杨玉良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越来越重视,

国家现在有能力也有条件去做古籍保护这项事业。而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宣传推广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动员群众和各界参与古籍保护工作中起到了引导促进作用。此次会议的召开不仅是对以前工作的总结,也能吸引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会上,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代表协会作年度工作报告。2016年,是“十三五”的起步之年,也是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承前启后,实现重要突破的一年,刘惠平从紧密围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积极

发挥行业组织的协调服务职能;引领社会力量投入古籍保护事业,努力搭建业界共建共享平台;加强自身建设,规范内部管理,不断完善协会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构建全方位、立体化、覆盖广的宣传体系,推进协会对内对外合作交流四个方面总结了协会2016年度工作,并对新一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2017年,协会一方面将围绕古籍保护工作重心,努力发挥职能作用、持续开拓事业发展的新路径,重点体现在继续开展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工

作、推进行业培训和交流合作不断落地、积极开展行业标准研制工作、拓展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工作等;另一方面,不断完善运行管理机制,强化自身建设,提升能力和水平,比如建立健全协会运行和内部办事机制,审慎筹备、分步成立协会的分支机构,制定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做好宣传推广交流工作等。常务副会长张志清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情况专题报告,分享“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和经验。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协会人事调整事项,增补山西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郑州枫华实业有限公司为常务理事;增补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等11家单位和个人为理事。

此外,会议还报告了理事建议案征集情况,通报表扬了参与2015-2016年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的单位,并向古籍保护公益资助单位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颁发了感谢状。



20家单位修复人员在陕西省图参加培训

本报讯(记者刘晓立)2017年3月20日至4月28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协办的“第六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在陕西省图书馆举办。来自全国17个省市、20家单位的23名学员参加了培训。20家单位中,除个别高校、文博单位及市级图书馆外,其余均为省级图书馆,学员均为各单位修复骨干或新生重点培养对象。

此次培训,除安排有古籍整理、古籍修复等理论课外,其余均为古籍修复实际案例讲解和具体修复实践课程。在传习所导师万群老师的指导下,学员将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馆藏部分破损《古今图书集成》进行科学、合理地修复。

修复陕西省图书馆藏《古今图书集成》是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成立以来的一项重要工作,2016年5月,针对《集成》的实际情况以及现在面临的修复问题,陕西省图书馆清雍正四年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保护研讨论证会举办,在听取各方专家科学、权威、审慎的修复意见后,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修复工作思路。在此基础上,第四期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举办。

此次培训班就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继去年五、六月份,在陕西省图书馆举办“第四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型培训模式的践行,在不断培养和提高修复人员技能的同时,更积累了修复大部头善本古籍的修复经验和管理经验;另外,也聚集了力量,为集中修复馆藏大部头善本古籍提供了可行性方案。这次培训,既是对陕西省成立“国家级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开展的更高层次古籍修复保护的又一次鼎力支持,也是为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申报国家级古籍修复保护基地,储备相应的资质条件,夯实基础。

斯道文库： 感悟两种修复理念的博弈

□王钊



2月20日，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6级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教授的带领下来到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访问学习。

庆应义塾大学创建于1858年，由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江户（东京旧称）创办，取“兰学塾”，又名“福泽屋”。庆应义塾大学共有4个图书馆，分布于三田、日吉、矢上和信浓汀4个校区，“斯道文库”位于三田校区的图书馆大楼4楼，专门收藏汉籍。

我们一行受到研究院顾问、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高桥智先生的热情接待。高桥先生为我们进行了详尽的讲解，

不仅引领我们见识了蝴蝶装宋刻本《通鉴纪事本末》、《永乐大典》残叶、开化纸抄文澜阁四库全书零本，也见到了日本托裱本宋元间刻《论语》、日本古抄本《论语》及骏河版铜活字本《文选》、高丽金属活字本《朱子语类》、越南刻本《大南寔录》等馆藏珍本。

在听过高桥智先生对中、日、韩及越南本古籍流传历史的讲解后，同学们还对参观的书籍进行了简单的破损调查。需要借助仪器的检测项目，受到设备限制无法进行，但较为常规的老化、水渍、虫蚀、鼠啮等肉眼可辨的破损调查，对于粗略了解古籍的保存情况，很有帮助。从修复痕迹看，与国内侧重于“整旧如旧”——尽可能维持古籍原有形制相比，这里的古籍是委托专业修复公司进行修复的，其修复理念更侧重于“优先保存文献内容”。“整旧如旧”还是“便于流传”，一直是古籍修复上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两种理念各有优劣，如何取舍，又如何妥当地选择修复方式方法，切实为古籍治病延寿，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斯道文库的古籍书架排列得井井有条。书架上固定有书网，以免发生地震时古籍跌落受损。进出书库的门口还放置有粘尘垫，工作人员进入时要在粘尘垫上踩踏数次，以除去鞋底灰尘，减少虫、菌的进入。此外，书库每两年还会请专业人员进行一次化学除虫杀菌。

小津和纸： 感受纸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陈皓 李燕

小津和纸起源于江户承应二年（1653），由小津清左卫门长弘在江户大传马町（现东京日本桥附近的小津和纸总部大楼所在地）创办，商号为“小津屋”，迄今已有364年的历史。

现在的小津和纸总店，一楼为商店和小津手工抄纸体验房，二楼为小津画廊和小津文化培训教室，三楼为小津史料馆和小津和纸展览厅。东京都中央区居民文化遗产约有一千份史料在纸展览厅保存和展出。

史料馆里陈列着大量小津和纸产业发展资料，包括珍贵的账簿、贡税请取证文、算盘等，见证了商店的发展。我们注意到，这些纸质文物都有修复的痕迹，且大多是送到私人装裱店采用托裱方式修复，让一直信奉“最小干预”原则的我们颇为疑惑。交流过程中，带队的杨光辉老师向他们介绍了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正在进行的古籍生物检测、古籍修复用纸检测以及科学修复技术研究等相关方面的情况，同时也表达了加强中日在纸张方面交流合作的想法。

此外，我们在小津和纸店也见到各式各样的和纸样本，以及常用的和



纸制作原料：黄蜀葵、三桠、楮树皮等，加深了我们对和纸制作工艺的了解。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对和纸文化的保护与继承，比如在充分开发和纸的使用价值方面，将和纸做成衣服、帽子，甚至是扇子等日常生活用品，并赋予其美感。在发展中国的传统造纸及文创产品开发方面，这些都给了我们许多借鉴和思考。

谈起日藏汉籍，静嘉堂文库是绕不过去的古城堡。“静嘉”一词，典出《诗经·大雅·既醉》：“其告维何，笾豆静嘉”句，意为古籍像上古时期笾豆之类的祭祀礼器，洁净美好，可供奉祖先。静嘉堂文库最初由在日本实业界称为“三菱的灵魂”的第二代社长岩崎弥之助于1892年创建，创建初衷是为其恩师重野安绎编修日本国史收集资料，第一任文库长即重野安绎。

静嘉堂文库目前藏书约为二十万册，其中汉籍十二万册，最重要部分是来自中国湖州陆心源的三大藏书楼——皕宋楼、十万卷楼及守先阁。因为陆氏书籍占静嘉堂藏汉籍量比例太大，以致静嘉堂文库在编制“分类目录”时只能将其分为陆氏本和诸家本两种。这次我们所调阅的书单，正是根据《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所选，主要选取的是陆氏藏书。

在文库周围散步，不仅可领略银杏参天、梅花盛开的日式园林风景，还可在山林间看到80公里外的富士山！富士山在日本谐音寓意“不死山”，代表永恒，旧时江户城（东京旧称）的显贵都争着在能够“富士

【日本考察
日记（二）】

庶昌、杨守敬跋《南华真经注疏》是蝴蝶装，原系日本金泽文库旧藏，卷首有当初为静嘉堂文库购买陆氏藏书的岛田翰印，卷末有清光绪九年杨守敬跋，又有清光绪十年黎庶昌跋，叙述其发现此书并刻入《古逸丛书》过程。想当年驻日公使黎庶昌及其僚属杨守敬在日恣意访求汉文古籍，而后岛田翰“模仿”前者，亦到中国恣意购书。《南华真经注疏》集齐三人足迹，默默承载着中日文化流动的信息，很是难得。

此次观摩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获，

静嘉堂文库： 凝视富士山的永恒宝藏

□任杰

见”的高地上盖房子，所以现在的北多摩郡也是东京的富人区，可以想到文库的位置有多么优越。

来到静嘉堂文库主体建筑前，负责接待的成泽女史已在门口。她介绍说，文库是94年前按典型的英式书斋形式设计的，目前除了灯和墙纸外，一切保持原样。进入文库，先是一个客厅，映入眼帘的是“静嘉堂”三字匾额，落款为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胡惟德（1863—1933），据介绍，这是胡惟德1909年拜访静嘉堂文库时为静嘉堂所题。

客厅的右手边是唯一的阅览室，室内非常干净，正面墙上横挂着清宣统帝师陈宝琛书赠的“道家蓬莱”匾额，抬头写“岩崎仁兄正书”六个小字，其字可谓逸品，“道家蓬莱”这四个字也很有意思，原为后汉东关的别名，《后汉书·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用来借指静嘉堂文库实在太恰当了！

阅览桌上，有成泽女史为我们准备好的国宝级的古籍十二种，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珍本，包括宋刊本《唐百家诗选》、宋刊本《大宋重修广韵》、宋刊蜀大字本《周礼》、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宋刊蜀大字本《三苏先生文集》、宋刊本《王右丞文集》、宋刊本《南华真经注疏》、宋湖北提举茶盐司刻本《汉书》、写本《杜工部集》、写本《酒经》、清刻本《群经音辨》、宋建刻本《白孔六帖》等。

印象最深刻的是黄丕烈跋《周礼》，黎庶昌、杨守敬跋《南华真经注疏》。《周礼》尤其漂亮，字大如钱，卷首有黄丕烈“百宋一廬”印，卷末有其手书跋文，叙述此书流传过程，使人不由得感叹书比人寿长。黎

就是发现了《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的一个小错误。当时选取《群经音辨》，主要是根据其目录中“写（影宋）”而定的，想看一下毛抄本。结果当天看见的书在杨光辉老师的仔细辨认下，认定是刻本而非写本。最后在卷末看注释，才明白此书是据宋本重刻，然后又根据影宋本校对而成。

静嘉堂文库将古籍修复中的“最小干预原则”贯彻得非常彻底，所有的装具、装帧形式都维持了当年陆家原貌，未作改动。成泽女史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敢断定做出改变会不会对书有不好的后果。虽说贯彻这个理念很好，但从我们的实际体验来讲，“最小干预原则”在此或许并不全然适用。比如有些书确实老化、霉变得比较厉害，或是书的装具变形明显，严重损害到它要保护的书籍。杨老师和同学们都对这种情况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希望文库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对这些古籍进行修复保护。



□广东 陈伟军 黄萍

自己动手，为藏书“看诊”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的藏书主要来源于国营的新华书店，出于爱惜，我常常用厚纸把书的封皮包裹起来，并在正面和书脊部位题写书名，那时候买的都是新书，没有修补的说法。后来随着国企改制，下岗人员增多，旧书市场悄然兴起，我买书的渠道也由新华书店逐渐转向路边的地摊儿和旧书店。旧书不同新书，它有破损、虫蛀、水渍、火烧、鼠咬、缺页、没封皮等各种情况不一而足。普通图书还好办，浆糊、白胶、机器纸，往破损处一粘，就完事。线装古书则不同，它非常娇嫩，极难伺候，不是行家里手，很难处置。因此，当在旧书市场收集了一大堆焦头烂尾、虫钻鼠啃的线装古书之后，我常常感到发愁，不知如何是好。

在多年修补普通图书经验的基础上，我开始自己下手修复线装古书。急用先学，我认真阅读了《古籍修复技艺》《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等书，从理论上掌握制作糨糊，搭配纸张，修复破洞等技术，熟悉补书过程的关键步骤和细节，做到心中有数。

我修补的第一本线装书是《史鉴节要便读（下）》，此书为清末刻印，存卷四至卷六，有少量的虫蛀、破损，版心也

有裂口。我从古书叶夹缝中间收集了一些老纸片，又用富强面粉制成糨糊，再找来剪刀、钻子、毛笔、铁锤等工具……一切准备就绪，我小心地拆下书页，轻轻地掀开摊平，让书页的缺陷充分地展现。然后用老纸条“溜口”，按照“先大洞后小孔”“先中间后周边”的原则，依次进行“补洞”。接着，把书页轻轻地提起来，悬挂着凉干。经过十多天的努力，树叶全部修补完毕。我把它们收集起来，折叠好，捶平后加上封皮装订。这书原本是毛装，修补后周边更是毛蓬蓬的，很难看，但我舍不得裁掉“毛边”，因为觉得老纸珍贵，心想不如等找到上册（卷一至卷三）搭配成套后，再一起裁切也不迟。

我修补的第二本线装书是《鼠疫汇编》。此书为家乡粤西的地方文献，又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防治鼠疫专著。我把它买回来后，心情兴奋，想写文章进行介绍，就急于补好以便查阅。书中略有破损、虫蚀，还缺欠封皮和刻书的牌记。由于有了《史鉴节要便读》的修补经验，此番已是驾轻就熟了。我如法炮制，将虫眼、破洞一一修复，还上网查证此书的版本，确定此书为清光绪辛丑年（1901）蓉园重雕本，于是，就将版权页（即

牌记）复制下来，放在书的前面，再扣上封皮装订好，至此，《鼠疫汇编》业已完整，可查阅。我即从书中寻找材料，写了《罗汝兰〈鼠疫汇编〉成书刻印概述》《光绪年间的〈鼠疫汇编〉》二篇文章，发表在当地的文史刊物和《藏书报》上。

此后，我又先后修复了木刻线装书《小学集解》（全4册）、《晏子春秋》（上册）、《幼学故事句解》（全4册）、《广释名》（全1册）、《学庸》（全1册）、《古文真宝前集》（全1册）、《孙子十家注》（全6册）等。其中《孙子十家注》为清咸丰年间淡香斋摆字版，线装6册，没有虫蛀，但纸张很薄，又被火烧灼过，第6册尤为严重。这册书的书根部位从上到下被烧开一个大洞，还烧坏不少文字。因破损严重，购买此书时，店家还同意给我很大的优惠。

《孙子十家注》破洞大、纸张薄、页数多，对我来说，是一项大工程，我小心翼翼地拆下书页，用极薄的手工纸进行粘贴修补。从2016年8月开始，到10月完工，断断续续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第6册因为每一叶都要修补，而且都是粘补在书根，最后导致这个部位比没有修补的地方高出很多，经过捶打，也不能使之平衡。

于是，我就用宣纸把“薄”处逐叶垫“厚”。因为加了衬纸，这本书比修补前厚出一倍多，我只好把它拆分开做2册，为此，《孙子十家注》便由原来的一套6册变成一套7册。

我的古书修复从《史鉴节要便读》开始，到完成《孙子十家注》时，补过的线装古书已有10多种20多册，一些破烂不堪的古旧书，补完后显得整洁妥贴，可藏可读又可玩。我也在修复活动中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配纸、溜口、补破洞虫眼、捶打书页、穿线装订等技艺，锻炼了耐性。我还发现：纸张结实、厚重的书易补，反之则难；有破损、没虫蛀的书易补，反之则难；天头、地脚的破损易补，版心、文字的破损则难……于是，我在购买品相不好的线装书时，尤为留意这几项。一次，我发现了一本清光绪丁亥夏月“江西广润门内甲戌坊乙照斋刻字书坊”的《补刻小学千家诗》，此书刻印俱佳，内容别致，封皮、牌记均在，只是天头被老鼠咬掉一大块，但版框内的文字无伤。我以为，如果把此书拍回来，略加修辑，那将是一个极好的藏书品种。不料因误解时间，原以为是块到嘴的肥肉，却让别人“捡”去，肠子都悔青了。

古籍修复是古籍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古籍鉴定、普查、修复、保护等各类培训班165期，培训8000余人次；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提出“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以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为依托，与高校合作建立古籍保护学科体系，培养古籍保护专业人才。但与数量庞大的古籍相比，能够修复古籍的技术人员却仍远远不够。

那么，除公藏单位的积极努力之外，对古籍感兴趣的民间人士能否自学古籍修复？非科班出身的“赤脚医生”们，在修复古籍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和感想？

□安徽 罗磊

“赤脚医生”的养成之路

能以修书混口饭吃，是我之前不曾想到的。

我是个爱书人，从小就喜欢看书，也喜欢画画，最喜欢的是连环画，陆陆续续买了有上千册。这些连环画品相良莠不齐，大多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出于对心爱之物的爱惜，常常自己试着进行简单修补。久而久之，看见墙上贴的纸发黄，就忍不住撕去四周的空白处，储备下来，作为修补用纸。说是修补，其实就是缺字的补字，缺角的补角，封面有伤及画面的，就发挥绘画功底，予以全色补上。后来又喜欢上收藏线装书，为了补线装书上的缺字，还苦练了很多年小楷，甚至用小楷写了几年日记。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几年后的一次周末，我又到书店蹭书看，无意中看到一本关于古籍修复的书，便翻看起来。看到图录上一本本破烂的书被修复完好，忍不住心痒，也想按这些方法试试。于是，我在常去的旧书摊儿上买了一本破烂的线装书，一开始没有浆糊，就到经常

打交道的裱画店要了一点，纸就用色宣。但就是这一次的尝试，让我在古籍修复学习和实践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慢慢地学会了用面粉提取淀粉来制作浆糊，补纸也不再宣纸，还买了古籍版本学、目录学、拍卖图录、纸张研究方面的书籍抽空研读，不懂的就查资料、记笔记。后来才知道，要成为合格的古籍修复师，要有过硬的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以及纸张鉴定，美术等方面的功底，而我无意识的兴趣，居然刚好摸到了边。

虽然修的书越来越多，却感觉进步很小，很多方面都不知如何处理。那时候我刚好要到外地实习，便去当地图书馆请教，修旧如旧的概念就是那时候的收获。2011年看到《探索·发现》播了一期国家图书馆修复古籍的纪录片，我马上当教材般得反复看了很多遍，在为大师精神感动的同时，也奠定了很多基础的概念。

离不开的贤内助

浑浑噩噩修书近十年，基本

各种破损都有了处理经验，妻子在我的影响下，也对修书产生浓厚兴趣。有一天她跟我说，何不帮人修书，只给自己修，多可惜。那是2014年春天的事。之后，她便忙着把自己的社交软件账号改成“婉婷古籍修复”，与古籍书友们建立联系，在空间里、群里发古籍对比图与大家分享。通过这种方式，结识了很多朋友，学到了很多知识。约二月有余，有朋友寄书来找我们修，这对已经没有信心的我们来说，无疑雪中送炭，顿时信心倍增。没过多久，寄书来的朋友越来越多，口碑也越来越好。原本只是想挣点外快用来买书，没想到慢慢地有点忙不过来了。期间，妻刚好有孕，索性辞去工作，安心在家修书，我下班回来就负责装订，修复严重的破损。后来孩子出世，便也辞去工作，回老家专门修书。

有朋友跟我说，有些修书人为了节约成本，用机器纸修书。对我来说，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没有好的修复纸，就一定宁缺毋滥，坚决不能因将就而毁了书。



作者妻子在修复古籍。

“赤脚医生”求拜师

不知不觉中，“婉婷古籍修复”已经经营了三年有余，很多师友都给予了很多指点与帮助，修复服务水平也一再得到提升。朋友告诉朋友，互相推介，渐渐也形成了品牌。要修的书越来越多，便增加了人手，工作量提升的同时，更加严格要求质量。我们虽然不是图书馆，但是工作态度和学习思路一定要向图书馆看齐，不然，不仅毁了书，也毁了前程。各行各业都有很多大师，也不乏一些百年老字号，修书也是技术，为何不能持之以恒，把书修到极致？

当然，我也意识到，要想成为真正优秀的古籍修复师，还得找一位专业的老师，学习大师的方法与技术，进一步提升。



首记琉璃厂肆，
勤拓石刻摩崖
李文藻万卷楼
LIVENZAO WANJUANLOU



李文藻万卷楼：

勤拓石刻摩崖， 首记琉璃厂肆

□北京 韦力

李文藻是清中期山东著名的文献大家，乾隆二十四年（1759）钱大昕主持山东乡试时，以第二名中试，被钱大昕叹为天下才，次年成进士，出纪晓岚门下。李文藻与钱大昕交情尤深，两人同处京师时，过从甚密。李文藻归里后，每月必有手书，其《南涧文集》就是由钱大昕作序，序中着重讲了李文藻嗜书之性：“南涧（李文藻晚号“南涧”）之性情，与予略相似。予好聚书，而南涧抄书之多过于予；予好金石，而南涧访碑之勤过于予；予好友朋，而南涧定谊之笃过于予；予好著述，而南涧诗文之富过于予。”

极好金石，一生搜罗尤富

李文藻去世后，其墓志铭亦出自钱大昕之手，在这篇墓志铭里，钱大昕又谈到了李文藻极好金石的个性：“于金石刻，搜罗尤富，所过学宫、寺观、岩洞崖壁，必停驂周览。有仆刘福者，善椎拓，携纸墨以从，有所得则尽拓之。”李文藻所到之处，只要见石头上刻有字，他就一定要停下来仔细辨认，尤其令我羡慕者，是他有一位叫刘福的仆人，对拓碑特别拿手。

类似的记载我至少读到过三处，比如天台野叟所著《大清见闻录》：“所至必停驂周览。有仆善椎拓，携纸墨以从，曾乘舟出迎总督，小憩南海庙，命仆拓碑，秉烛竟夜，及晓问总督舟已过矣。”记载称，李文藻某次乘船前去迎接上级领导，在小庙里等候时，又发现了未曾著录的碑刻，于是他立即让刘福进行椎拓，他们点着蜡烛，竟然干了一整夜，等到天明时，才想起正事，而领导的船早已过去了。同样的故事也记载于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中。

对于拓碑之事，李文藻从不回避自己的挚爱，他在乾隆四十三年，曾经写过一篇《自诌文》，文中有这样的话：“因访城内外岩洞之摩崖刻，应拓者且千种，多出张凤鸣、桂胜之手，遂竭其力而为之。意又在乎阐微表幽，求不湮古人之名。觉区区编录之名，亦不必自居，乃不数月，而衣物典尽，纸墨梯架之费，实不能继。”在一个地方他想拓的石刻就有上千种，那可想而知他所藏的拓片是何等的丰富，可惜没有目录留下来，但以我的估计，他所藏的数量一定超过了后来的叶昌炽。李文藻说，他为了拓这些碑，经常搞得自己囊中羞涩，仅拓这一处，就花了几个月时间，搞得最后连买纸墨和架梯子的钱都没有了，看来他的的确确是个痴情的人。

亦藏亦著，曾编两部方志

除碑帖这个品种之外，作为文献大家，李文藻在藏书方面，也同样有着较高的成就。他对书的情感在钱大昕给他所写的墓志铭中也有记录：“……性好聚书，每入肆见异书，辄典衣取债致之。又从友朋借钞，藏券数万卷，皆手自雘校。”

当年在北京时，李文藻常到纪晓岚家去抄书，他曾经在纪府看到惠栋的《易汉学》，于是就将这部书全部抄了下来，因为正赶上夏天，他“漫肤多汗，沾渍衣襟，不以为苦”，让纪晓岚看到后也赞叹不已。李文藻的确很喜欢抄书，他在乾隆十七年时，听说书贾刘雪友藏有《海岱会集》抄本，想借来一看，但刘不愿，于是李文藻就买了一件裘皮大衣送给了此人，这才得到底本，让他抄录了一遍，可见，当年其得书之难，以及其对书之痴。

李文藻对乡邦文献也很关注，他曾编过两部名气很大的方志——《诸城县志》和《历城县志》，其中《历城县志》因为列举各家之说，并且所有内容大多注明出处，很受后世夸奖，章学诚就曾称赞此志说：“无一字不著来历”，可见李文藻对地方志的书写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曾经说：“志与史同也，亦异也，扬往迹以励将来，同也；史编天下之大，志录一邑之小。”该志初次刊刻于乾隆三十八年，因为名气大，受到后世追捧，也使得该书变得稀见难得。

书业信史，首记琉璃厂肆

李文藻极有可能是最早详细记述琉璃厂书肆的人，他的《琉璃厂书肆记》写于乾隆年间，不仅记述了自己在厂肆所购及所见，还详细记载了各间书肆的名号、店主和所售书籍的来源，为古书流传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自他以后，缪荃孙、叶德辉、陈乃乾以及雷梦水等，皆仿其例，纷纷撰写与琉璃厂书肆相关的文章。李文藻的这篇“书肆记”中，说出了作此文的原因：“……此次居京师五月余，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钞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出京后，逆旅长夜不能寐，乃追忆各肆之名号及所市书之大略记之。”这篇文章虽然不长，却基本上把重要的旧书店都点到了，他总计在京也就150多天，却留下了这样翔实的史料，的确极具有文献家的素养，让人钦佩。

人能超过魏鹤山，但是魏的经学著作世上罕传，所以，魏的观点也很少人采用。周永年听到后，“书昌亦心折其言”，他很佩服老韦的见解。在他的书店——鉴古堂中，李文藻买到了几十部曹寅的旧藏，都钤有曹寅的外甥昌龄的藏书印。李文藻还说，他的老师纪晓岚也在鉴古堂买过不少的书，并且花了几千元。

书稿散失，万卷楼毫无遗迹

李文藻的藏书处主要有竹西书屋、大云山房、训厚堂等，所藏多达数万卷之多，其藏书印亦多，经王献唐先生搜集整理，已知有二十方之多。李文藻先后写过三部书目，分别是《所藏书目》《所见书目》和《所闻书目》，惜皆已不传。又刻过《贷园丛书》，周永年为之作序，称：“《贷园丛书》初集，共十二种，其板皆取诸青州李南涧家，其不曰‘大云山房丛书’者，何也？曰尚思续刻以益之。凡藏弃书板者，又将多所借以广之，不必以一家故也。”

此次前往寻访的，是李文藻位于家乡山东青州的藏书楼万卷楼，其遗址在山东省青州市粮市街与昭德街一带，现已为一片新盖民房，毫无遗迹可寻。

出发前，在网上查得，在粮市路南的双井街有着李文藻故居，因其家有万卷藏书，故将藏书楼命名为万卷楼。粮市街并不难找，但站在粮市街与双井街交汇处，我却愣了，眼前只是一片非常普通的现代民居，最古老的房子大概为上世纪80年代所建，根本没有什么名人故居。幸而后来有辗转找到李文藻的后人，知道我是来寻访李文藻资料后，老人家略有激动，十分自豪，一开口就说：“当年乾隆皇帝赐了十个字给他，后来我们家就用这十个字来排辈分，我是第七代，他（旁边的儿子）是第八代。”那十个字分别为“文章诗故姓，道德述先贤”。老人家是第七代，德字辈，叫李德昌。我请教他李文藻当年藏书的事，他愣了一下，解释说，上几代没落，书都卖掉了，李文藻的墓也扒了，连遗址都无法确认，至于万卷楼，也早就没有了。

李文藻在去世之前，念念不忘者，就是他的著作：“予岁在纪府师宅住两个月，多所见闻，欲录为一书，名《平台啜茗录》，惜未果也，若不死，此书三日可成……”对于自己的著述，李文藻也希望能够刊刻传世：“予之诗，求钱老师、纪老师、翁学士、邵二云、张药房、罗台山定之皆可，一半年内即定即刻，千万！千万！”可惜的是，李文藻去世之后，他的儿孙们没有按照他的嘱托将著作刊刻出来，而后，李文藻的书稿渐渐散失，后来家里又着了大火，他的手稿以及他的藏书，基本上损失干净了，想到这一层，真让人感叹唏嘘。



现在的琉璃厂街景。